

1949—1976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基于口述史的研究

胡艳,郑新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 1949—1976年,中国乡村学校在校生人数快速增长,1976年全国乡村小学、初中、高中的入学学生分别以几倍、十几倍和几十倍的数字高于开始有统计资料的1962年。这种情况,没有大批教师的补充和任用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满足乡村教师队伍急剧扩充的需要呢?除了少量政府文件,很难找到相关文字资料,也没有研究成果可供参考。有鉴于此,口述史研究就成了弥补这一不足的好办法。本课题的研究者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46位有代表性的乡村教师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口述资料,结合国家教育政策,发现,当时是采取政府配给和乡村自聘相结合的办法实现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家政策,把大批本地生长、出身不同、学历不一、水平参差的人员补充到教学第一线。这种方法造就了一批热爱教育、热爱乡村、师德高尚、锐意进取的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育、文化、社会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今天新时代的乡村教育来说,历史上作为权宜之计的乡村教师补充任用办法,是值得借用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 乡村教师;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乡村教育;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8)04-0015-11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色,中国的现代化离开了乡村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完整、也不可能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①,我们迫切需要振兴乡村,“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②。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然而,如同其他国家处境不利地区一样,乡村师资的补充任用一直是制约我国乡村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尽管如此,“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在乡村教师补充任用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它为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及后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现代化建设人

才的培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时期的乡村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教师的补充、任用鲜有研究,来自官方的资料也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有鉴于此,口述史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乡村儿童发展对乡村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试图运用口述史方法对那个时期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以总结经验,为今天发展不利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一、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涉及1949—1976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资料较少,很多官方档案资料不完整,目前

[收稿日期] 2017-10-20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学视角下的新中国民办代课教师的历史研究”(16JYA001)。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0—11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第4—5页。

也不便公开,即使少量公开的资料主要局限在政策层面,其科学性和完整性也有待加强,给这一时期乡村教师研究带来很多困难。这种情况下,口述史成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口述史是由亲历者的口述组成的丰富、灵动、充满个人情感和体悟的资料,虽样本量有限,客观性也有待商榷,但借助访谈而获得的第一手回忆帮助我们获得了从官方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从2013年起,课题组以“乡村教师的生命历程”为主题,选择1976年之前入职并一直从教于乡村学校的教师作为口述史访谈对象并开始了研究历程。由于这些教师年纪偏大,身处乡村,交通不便,我们采取便利性原则,发动我们的同事和研究生采用滚雪球方式开展此项工作。迄今为止,我们访谈了近70位这一时期入职的乡村教师,访谈内容包括乡村学校的建立、发展,乡村教师在其中的角色、作用,乡村教师的出身、补充任用、工作和生

活状态等。根据口述研究规范,在征得口述者本人同意的基础上,本文将其中46位乡村教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分布在全国18个省份,受访者的年龄跨度长达29年(1925—1954年期间出生),其中72%受访者这个民族为男性,28%为女性;少数民族9人,分属满、藏、苗、傣、彝、达斡尔六个民族。他们入职时的身份或为民办教师(占受访者的54.2%)或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多数经历了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转为公办教师。他们的职业生涯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见证了我国乡村基础教育从一位教师几名学生在破庙、祠堂、仓库、村民房檐下上课,到拥有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办公楼、实验室,学校规模达到上百甚至上千人的变化过程。他们是新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表1 受访教师的基本情况(按年龄排序)

序号/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为汉族)	出生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学历	入职时间/年龄	初入职学段	身份/民转公时间	退休时间	教龄
1/A	男	地主 ^①	福建	1925	1935—1947	高中	1947/22	初中	公办	1985	14
2/B	女	地主	安徽	1929	1935—1947	中师	1947/18	小学	公办	1984	37
3/C	男	贫农	四川	1929	1935—1941 1949—1955 ^②	初师	1955/26	小学	公办	1995	40
4/D	男	贫农	云南/傣	1930	1942—1955	中师	1955/25	小学	公办	1990	35
5/E	男	中农	河南	1930	1935—1947 1953—1957	中师肄业 ^③	1949/19	小学	民办/1980	1991	19
6/F	女	地主	贵州	1930	1937—1948	中师	1949/19	小学	公办	1988	39
7/G	男	农民 ^④	山东	1930	1938—1949	师资速成班	1949/19	小学	民办	1976	27
8/H	男	农民	山东	1931	1939—1947	私塾	1948/17	小学	民办/1980	1991	27
9/I	男	地主	云南	1932	1940—1949	中学	1950/18	小学	公办	1992	42

- ① 访谈中该教师未提及自己的家庭出身,但说外祖父是地主,很有钱。我们根据中国传统婚姻门当户对原则推测他出身地主。该教师1947年入职,1952年在福州大学学习一年后回校任教,1961年调工业部门工作,1963年调某市教育局工作。1961年之后未再从事一线教学。
- ② 该教师就学经历坎坷,1935—1941年读小学,毕业后因生活困难失学,1949年后通过考试就读简易师范,1954年再读初级师范一年。
- ③ 该教师1948年中师肄业,1953—1957年就读师范学院,因被错划为右派未获得毕业证书(后补发)。本处记录的是首次当教师的初始学历。
- ④ 表中多位教师自称农民出身,但家里有几亩田地,可供子女上学,估计实际成分在中农及以上。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 为汉族)	出生 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 学历	入职时间 /年龄	初入职 学段	身份/民转 公时间	退休 时间	教龄
10/J	女	佃农	河北/满	1932	不清晰	初师	1955/23	小学	公办	1983	28
11/K	女	农民	河北/满	1934	1949—1952	简师	1952/18	小学	公办	1990	38
12/L	男	贫农	浙江	1934	1940—1949	高中肄业	1950/16	小学	民办转公 时间不详	1994	44
13/M	男	地主	北京	1937	1942—1958	师专	1958/21	高中	公办	2004	46
14/N	男	贫农	云南/傣	1937	1945—1958	初师	1958/21	小学	公办	1989	31
15/O	女	工商业者	湖南	1937	1946—1958	中师	1958/21	小学	公办	1992	34
16/P	女	地主	北京	1939	1944—1958	高中	1958/19	初中	公办	1996	38
17/Q	女	地主	河南	1938	1970—1999	中专	1970①/32	小学	民办/1999	1999	30
18/R	女	贫农	河北/满	1939	1954—1960	小学	1960/21	小学	民办未转	1983	23
19/S	男	工商业者	安徽	1940	1946—1963	中师	1963/23	初中	公办	2001	38
20/T	男	农民	安徽	1940	1945—1959	中师	1959/19	小学	公办	2000	42
21/U	男	贫农	山东	1940	1951—1963	中师	1963/23	小学	公办	1996	34
22/V	男	贫农	安徽	1940	1948—1959	中师	1959/23	小学	公办	2001	42
23/W	男	贫农	四川/彝	1940	1947—1957	小学	1957/17	小学	民办	1991	34
24/X	男	中农	河南	1940	1947—1955	初中/简师	1958/18	小学	民办/ 1987②	1999	41
25/Y	男	贫农	河北	1940	1950—1956 1958—1960	初中	1960/20	小学	民办/ 1984③	2000	37
26/Z	男	地主	山西	1941	1955—1960	高中	1961/20	小学	公办	2010	49
27/Aa	男	地主	江西	1941	1951—1961	初中	1961/20	小学	民办/1981	2001	40
28/Ba	男	自耕农	湖南	1941	1950—1958	中学	1958/17	小学	民办	1972 离 开教职	14
29/Ca	女	地主	安徽	1946	1962—1965	高中	1965/19	小学	民办/1981	2001	36
30/Da	女	贫农	广东	1942	1952—1958	小学	1961/19	小学	民办/1979	1997	36
31/Ea	男	中农	安徽	1942	1951—1963	中师	1963/21	小学	公办	2002	40
32/Fa	男	贫农	河南	1943	1951—1962	中师	1963/20	小学	公办	2003	40

① 该教师 1960 年曾任扫盲教师一年多,因白天劳动,晚上教课,自认非正式教师。

② 该教师 1955 年初中毕业后就读短期师范半年,后又带薪学习,毕业后由当地教育部门分配,身份为公办教师。1962 年因国家经济困难,教育部门要求 1958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教师一律下放,由此改为民办教师,1987 年通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

③ 该教师 1960—1983 年为民办教师,1963—1966 年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被精简回乡,1966 年又因师资不足回到学校任民办教师。1984 年转为公办教师。

续表

序号/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为汉族)	出生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学历	入职时间/年龄	初入职 学段	身份/民转 公时间	退休 时间	教龄
33/Ga	男	贫农	辽宁	1943	1951—1963	高中 中师函授	1963 1975 ^① /20	小学	民办/2000	2003	28
34/Ha	男	中农	河南	1944	1953—1962	民中 ^②	1962/18	小学	民办/1984	2005	43
35/Ia	女	贫农	河北	1945	1952—1962	初中	1963/18	小学	民办/1986	2000	37
36/Ja	男	农民	安徽	1945	1955—1961 1965—1968	中师	1968/23	小学	公办	2005	37
37/Ka	女	富农	山东	1946	1954—1966/ 1968 ^③	高中	1969/23	小学	民办/ 1984	2002	33
38/La	男	贫农	安徽	1947	1953—1966	高中	1967/20	小学	民办/1971	2007	40
39/Ma	男	贫农	湖南	1947	1954—1963	初中	1964/17	小学	民办/1996	2007	41
40/Na	男	贫农	内蒙/达斡尔	1947	1955—1972	中师	1972/25	中学	公办	2002	30
41/Oa	男	贫农	河南	1950	1957—1968	初中	1969/19	小学	民办/2000	2010	41
42/Pa	男	贫农	西藏/藏	1950	1970—1975	初师	1975/25	小学	公办	2012	
43/Qa	男	中农	河北	1951	1958—1971	初中	1971/20	小学	民办/1997	2011	40
44/Ra	女	干部	江西	1952	1958—1966	小学	1968/16	小学肄业	民办/2010	2016	48
45/Sa	男	不好 (未明确)	河北	1952	1962—1971 1980—1982	初中 大专	1971/19	小学	民办/2004	1982	30
46/Ta	男	贫农	贵州/苗	1954	1961—1973	高中	1973/19	小学	代课	2008	35

二、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①,提出了“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②目标,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展开并为之服务。工作重心的变化直接影响乡村教育的建设及乡村教师的配备。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恢复秩序,“一五”工业化建设,“大跃进”,

60年代的调整、巩固、整顿、提高,“文革”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多有变化,但包括师资配备在内的乡村学校建设发展的政策基本保持一致,即由乡村基层组织承担主要责任,教育行政部门承担辅助责任。这在乡村教育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关于师资补充任用的政策表述中均有体现。

(一)乡村教育的初建与吸纳旧知识分子和“群众教师”补充教师队伍(1949—1952)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① 该教师 1963 年第一次入职,工作两月后因不明原因被辞退,1975 年再任民办教师。

② 类似农业中学或耕读中学,初中程度。

③ 1966 年该教师高中毕业准备高考,学校把学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同时等待高考。直到 1968 年实在无升学希望,学校才让他们离校。

④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949)中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2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0 页。

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①的方针,要求“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应以普及为主……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②。1951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提出:新中国教育要“满足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需要”,“必须使全国学龄儿童80%入学,同时使一部分幼儿受到适当的教养”,“十年之内争取全国学龄儿童基本上全部入学,五年之内争取全国学龄儿童80%入学”^③。普及教育是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重点。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现代教育相当薄弱的乡村开始了自晚清新教育推行以来从未有过的办学热潮。广大乡村地区一方面恢复已有的学校秩序,另一方面因陋就简,利用祠堂、庙宇、民宅开办学校,成绩斐然^④。此时期,师资短缺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在师范教育薄弱、短期内不能提供所需师资的当时,“举办培训班、师资训练班,吸收失业知识分子予以训练后,俾得参加地方财经文教及其他工作”^⑤成为师资补充的首选政策,很多在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一渠道成为教师,本访谈中几位1950年前后入职的教师多是通过此方式进入教师队伍的。但1949年以前教育薄弱,知识分子数量极其有限,“继续提倡以民教民的群众教师和小先生的办法,以及学校实行二部制等办法”也是当时另外一个补充师资的途径^⑥。这一政策使此时期的民办教师比例在全国

中小学教师队伍中达到1/3左右^⑦。

(二)乡村教育相对弱化与教师补充以乡村自己解决为主政策的确立(1953—1957)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建设亟需大量的中高级建设人才,国家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中高等教育,特别是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理科教育^⑧。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工矿区和大城市,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应作适当照顾;从高中、初中而言,重点是高中,初中也应按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作适当发展”^⑨。在人财物有限的当时,农村基础教育不得不让位于人才教育,但此前中央提出的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又不能动摇,国家遂把乡村教育建设的希望寄托在乡村自己身上,解决的途径是发动群众办学。

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教育部就倡导“群众办学”,群众自己解决经费、聘请教师^⑩。这一政策在1952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整顿和发展民办小学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提出:“在农村,为适当解决农民子女入学的问题,应根据需要与自愿的原则,提倡民办小学(包括完全小学),充分发挥群众自己办学的积极性。各地人民政府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加强指导,帮助解决师资、教材等问题。对乡村公立小学,除

- ①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 ②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页。
- ③ 钱俊瑞:《用革命的办法办好人民教育: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3—114页。
- ④ 1949年到1953年,仅小学校数就增加了50%以上,小学生数增加了一倍多。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1954.5.2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328页。
- ⑤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页。
- ⑥ 《教育部关于整顿和发展民办小学的指示(1952.11.1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80页。
- ⑦ 《1949—1993年中小学民办教师发展状况表》,转引自王献玲:《中国民办教师始末》,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9页。
- ⑧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7页。
- ⑨ 林砺儒:《关于目前全国中学教育的基本情况与今后的方针任务》,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78页。
- ⑩ 韦恂:《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0页。

在学校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 and 老革命根据地应作适当发展外,其他地区均应以整顿提高为主,一般不作发展。”^①由于当时农村经济水平不高,乡村无力自己办学,民办学校数和教师数反而下降^②,但群众自己办学校,自己解决师资的政策导向已经明确。

(三)乡村教育快速发展与“能者为师”解决乡村师资的政策(1958—1966)

“大跃进”期间及之后的调整、整顿时期是我国教育迅猛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还提出大力发展中等教育,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再用15年时间加以提高的目标^③。乡村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面对国民经济依然窘迫和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现实条件,中央倡导发展乡村教育的思路是自力更生。1958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两条腿走路”发展农村中学的思路^④,1964年刘少奇提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⑤。这个时期乡村教育发展主导思想是“以民办为主,国家补助为辅”^⑥,要求农

民自己办学,鼓励“群众自办自管”,“谁受益谁出钱”,由家长合理分担教师工资,社里尽量不补贴或少补贴^⑦。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办了大量的简易小学、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⑧,师资短缺问题更为突出。

为解决师资极度匮乏状况,中央提出“走群众路线,多想办法,做到多、快、好、省”^⑨,采取“‘志愿兵’的办法组织革命的教师队伍。……目前教师来源,主要是就地取材,能者为师”^⑩,并主张学习河北农村解决师资的办法:一是合并全日制小学的学生额不足班,腾出师资和校舍招收简易班;二是聘请回乡知识青年担当教师,不脱产,备课和上课时间补助工分。如上午参加集体劳动记工分,下午备课,晚上上课(晚班);或上午参加集体劳动记工分,下午上课,晚上备课(下午班)^⑪。这种方式相当长时期成为解决乡村学校师资匮乏的主要方式。民办教师数量也因此而迅速增加。

(四)乡村教师身份的原籍化、民办化政策(1966—1976)

“文革”期间,乡村教育按照惯性维持,而师资补充任用仍延续之前的政策,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对农村教育、农村教师影响颇大的事件——公办教育民办化,公办教师原籍化、民办化。1968年11

- ①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63页。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9页。
- ③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2页。
- ④ 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公办民办并举”,农业合作社自己可以办学,倡导农村办农业中学。《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22页。
- ⑤ 刘少奇:《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8.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96—1297页。
- ⑥ 《办好农村简易小学(1964.1)》,《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5.7)》,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48、1357—1358页。
- ⑦ 《教育部转发江苏等省关于农村幼儿园的四个文件的通知(1958-7-2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46页。
- ⑧ 196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84.7%,民办小学在校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40.9%。农业中学和半耕半读中学发展迅速,1965年我国有农业中学54332所,在校生316.69万人;有半工/农半读中学7294所,在校生126.6万人。《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26、123、180—181页。
- ⑨ 《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1958.6.20)》,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39页。
- ⑩ 《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1965.7.1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58页。
- ⑪ 《中共中央转河北农村教育问题的两个材料(1964.6.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80页。

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组两名干部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这封信一经发表立即变成政策在乡村实施,有的地方公办学校转为民办,由乡村基层政府承担办学责任,乡村公办教师被强行返回原籍,由按月发放工资改为拿工分,教师本人及其子女被转为农业户口^①。有的地方乡村为数不多的公办小学因此受到很大冲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教师的人数和在整个教师队伍中的比例迅速提升。

由上可见,1978年以前我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以乡村基层组织自力更生为主,政府帮助支持为辅。其结果是乡村教师队伍由公办和民办两个群体组成,前者由教育主管部门配备,后者则由乡村社、队自己聘用,且人数众多,比例不小。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实际运作及其特征

既然乡村学校教师的补充任用是政府和社队两个渠道进行,那么它们各自是以怎样的方式操作,积累了哪些经验,给乡村教师队伍带来怎样的群体特征?

(一)补充任用方式

1. 政府配给

虽因经济困难和师范教育力量薄弱,国家在乡村师资的补充方面鼓励乡村自力更生,但通过访谈获知,国家还是承担着乡村师资补充的重要责任,受访教师中有47.8%是公办教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发现,政府补充教师的方式有三:一是任用有一定文化基础又经过短期培训的人。访谈发现,1955年之前入职的教师因在1949年以前接受教育,思想意识、知识水平与新的要求有差距,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短期培训,给这些教师以政治思想和专业教育,使之成为新时代合格的人民教师。访谈对象A、B、E、F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培养师范毕业生。表1中有17名来自这个群体,占访谈教师的36.9%(不包括1949年以前的师范毕业生)。这些人通过考试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当

地教育部门分配在家乡附近乡村公办学校任教。三是招募具有正规初、高中文凭的毕业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拥有中学文凭就被社会认可为文化人,是难得的人才,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面对学校的遍地开花和师资的极度匮乏之间的矛盾,一些地方的文教局以公开招募或者直接进校挑选的方式,把优秀中学毕业生充实到乡村教师队伍。这些人有的有城市居民户口,但因出身问题失去上大学或高中的机会,通过这一途径成为乡村教师,如福建的A,北京的P,山西的Z等。有的原来就生活在农村,被文教局直接从中学遴选后分配至乡村做教师,如云南的I,江西的Ka、Ca夫妇,安徽的La老师,贵州的Ta老师等。这些经教育行政部门招聘的教师通常以公办教师身份入职。

2. 社队自聘

1976年以前,要成为乡村教师,主要通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及党员群众推荐,经所在基层组织开会同意。这些教师通常是本队、本村的农民子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人品好,出身符合当时要求。本研究中,社队自聘教师24位,占访谈对象52.2%。与师范毕业生相比,这类教师基本未接受师范专业训练,属于非正式在编人员,其身份是民办或代课教师。

(二)乡村教师的特征

访谈发现,与今天那些拥有师范文凭、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相比,1949—1976年乡村教师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

1. 来源本地化

由于乡村教育以“群众自办”为原则,学校办学权属于乡村基层组织,教师任用权自然也如此,这就形成了生源、师资均来自本乡本土的特点。本研究中除两位北京教师外(一位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江苏人,毕业后分配至京郊农村校,另一位是寄养在北京亲戚家的山东人,中学毕业后分配至京郊农村校),其他教师都是本地人。中师毕业生也一般分配回本乡或邻近乡学校任教。教师来源的本地化带来教师与乡村社会密切的血脉和人情关系。

2. 家庭出身不同

1949—1976年,出身是能否成为教师的重要

^①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26页。

考量因素之一,很多老师反映招募教师的条件之一是“出身好”。但在师资匮乏时期,仍有不少地方依然招募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表1显示,访谈教师中地主家庭出身者12名,占受访教师的26%;贫农出身者20名,占43.5%;中农及工商业者13名,占28.3%。可见,当时乡村基层组织在任用教师时考虑更多的是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

3. 民办公办兼有

访谈发现,乡村学校中教师身份民办、公办均有。公办教师一般在乡中心小学或初中任教,而村小、教学点和耕读小学等多为民办或代课教师。

4. 学历不同,入职年龄大小不一,质量参差不齐

从表1可发现,公办教师的学历和年龄较为整齐,多为师范毕业,至少初中以上学历,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

民办教师的学历情况复杂。受访教师中有私塾学历者1名,小学文凭者4名,初中文凭(包括初师、师资速成班)者12名,高中或中专学历者7名,大多未经过师范专业训练。有教师反映:“(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因为缺老师,各种学历的人都可以当老师,中学毕业教中学,小学毕业教小学的比比皆是”。这些教师入职年龄差距很大,从表1看,年龄在15—32岁之间不等。上述情况的差异带来了教育质量的差异,他们中的一些人教学质量不错,但也有一些人或管理学生不行,或上课效果不佳,教学中甚至存在知识错误的情况。那些学历低、年龄小的教师刚入职时自己还是孩子,很难胜任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

5. 女性教师很少

研究发现,乡村教师中女性较少,这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有关。接受访谈的46位教师中仅有13名女教师,占比28.3%。当时农村一般不愿意让女孩子读书,认为是为人做嫁衣。家长让她们或做家务以减轻父母负担,或参加劳动挣工分供兄弟上学,即便上学也经常因家务负担而请假旷课。接受访谈的几位女性教师均有此种经历。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特点

特殊的乡村教师配给政策使那个时代的教师补充任用具有独特性。

1. 灵活掌握标准

研究发现,当时乡村教师任用条件并不严格。比较而言,公办教师的学历、年龄等相对整齐,多数为正规中师毕业,少数初师、简师或中学毕业。民办教师的任用情况复杂,受访民办教师的学历、出身、年龄等差别很大,看不出有固定的标准。这显然是因地制宜、“能者为师”的乡村教师任用政策所致。

这一特点在对待教师出身的问题上表现尤其明显。国家政策规定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民教师”^①,196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师范院校招生要“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严格政治审查,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②。这个政策在任用教师时也适用。访谈中很多老师反映:“在六七十年代考师范是非常讲究家庭成份的,当老师也是有家庭成份的限制。只有从爷爷辈、父辈开始是典型的贫下中农子弟才行。像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就属于成份不好,他们就不能当老师。”但因乡村教师缺乏,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些教师反映,家庭成份对能否当教师、上师范不产生实质影响,表1中有26%的教师出身地富家庭似可证明。有些地方对教师家庭出身有严格规定,但在招不到合适教师的情况下会灵活掌握。如河南的Q老师出身不合政策规定,但所在地区七个自然村招不到老师,本人品行好,工作积极,加之哥哥是党员,表现也不错,被推举成为民办教师。

2. 基层组织拥有教师任用的绝对权力

访谈发现,在生产队、大队、公社举办的学校中,基层干部决定着教师补充任用的标准和人选,“关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受访的民办教师绝大多数是公社或大队干部的亲友,还有的是因为本人知识和人品得到干部认可而获得推荐或任命。研究还发现,因为学校在地理位置和办学条件上有

①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8.26)》,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8页。

② 《教育部关于保证中小学师资质量问题的两项通知》,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29页。

优劣差异,“关系”也成为决定教师校际流动的重要因素。通常,在出身以及与基层干部的关系上不占优势的教师分配到偏远学校的几率更大,向下流动的频率也更高,访谈中若干位教师均有此类反映。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成绩及影响

1976年以前的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也影响了乡村社会文化经济建设,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乡村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绩

1. 乡村基础教育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

虽然历经曲折,1976年以前教育发展成绩依然惊人。据统计,1949年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2400万,占学龄人口25%;中学生130万,同龄入学率为3%^①。“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还被关在学校门外。”^②许多乡村没有现代学校,不得不依赖私塾实施基础教育。但到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已达11838.7万人,占学龄儿童的96%,是1949年的3.9倍;中等学校在校生5905.5万人^③,是1949年的44.4倍。乡村教育发展也是如此,1962年开始有统计资料,当年农村小学生有5344.4万人,1976年有13285.3万人,是1962年的2.5倍;农村初中生1962年有229.7万人,1976年有3274.9万人,是1962年的14.3倍;农村高中学生1962年有10.4万人,1976年有924.6万人,是1962年的88.9倍^④。如果乡村教育发展的数据从1949年开始计算,结果应该更加惊人。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灵活的师资补充机制,没有大量正规、非正规的教师源源不断地进入乡村教师队伍,我国的乡村教育发展或许不会如此顺利,如此快速。接受访谈的教师几乎都是当地第一所小学或中学的创建者,绝大多数曾是村里唯一的教师。他们虽然身份特殊,有些人专业素质不太理想,但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儿

童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

2. 形成了一支热爱乡村、热爱教育、师德高尚、锐意进取的乡村教师队伍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教育建设发展重心的转移,使乡村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机遇。绝大多数受访教师在谈到他们的工作历程时都展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1)自力更生,创建学校

这一时期的乡村学校大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陋到完善的过程,受访教师大多有边建校边教学的经历。初期没有校舍,没有课桌椅,没有基本的教具和实验设备,乡村教师或组织师生割茅草建校舍,或利用村里的祠堂、破庙,甚至在自家辟出一间小屋当教室。学校创建后,他们就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动用各种关系争取基层政府、企业支持学校建设,如提供建校物资、配备教学器材。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自己动手做课桌椅,就地取材制作教具。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许多原来只有泥巴桌、凳的简易学校变成了窗明几净、桌椅齐全、仪器完备的正规中小学。

(2)自编教材,开展教学

受访教师多数有自编教材的经历。那时,由于办学经费紧张,一些学校没有教材。河北Ia老师从教时一度没有课本,她就自编语文和数学教材开展教学;此外她还自学广播体操,自编游戏充实体育课;自编快板说唱充实音乐课。70年代初,安徽La老师用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作为教学内容,授课时把诗词的创作和典故等文史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又找文言文名篇教给学生,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在有限的条件下体会到语文的魅力和价值。

(3)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由于乡村学校生活条件差,一些学生很难坚持学习。为此,乡村教师开动脑筋、身体力行,改善师

① [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②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1950.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8页。

③ 小学校数、在校生数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简表,1949—1990年各类学校学生数,刘英杰:《教育大事典(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76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197页。

生生活,让学校成为有吸引力的地方。“文革”期间,Aa老师所在小学的学生多来自方圆20里的村庄,他们平日住校,周末回家带来一周的米和菜。那时没有冰箱,热天学生带来的菜很快就变质。为解决住校生的吃菜问题,Aa教师请求生产队给学校两分地,每天下午放学后带着高年级的住宿生到菜地里干活,从而解决了师生的吃菜问题。秋收时节,他带领学生搞小秋收,捡拾秋收后剩余的稻穗、茶籽,补充了学生的粮食和菜油。其他许多教师也有类似的经历。

(4) 爱人律己,师道尊严

访谈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教师的忘我精神和朴素情怀。江西Ra老师是南下干部的女儿,她放弃顶职进城、知青返城、上大学等机会,坚守在大山顶上做一名“赤脚教师”(当地群众对民办教师的称谓)长达四十多年,直到2010年才转为公办教师。她挂在嘴边的话是:“如果我走了,我的命运改变了,但这么多孩子这个学期就没人教了。”在这所独自创办的山区小学,她培育了四代人。她坚持每周带领学生升国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步行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向名师请教;用微薄的工资负担校舍租金和学生的午餐;将自家的房子扩建为教室,并自制教具;自己出钱租车,带山里的孩子去看外面城里的大世界。作为乡村教师,她从不计较工资低、评职称压力大,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云南A、D,贵州F,山西Z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受访教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用心去做每一件看似琐碎的工作。有些学生路途遥远,山路上还时常会有野兽出没,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也为了让他们能坚持上学,C、D、F、N、Aa等教师都有过每天护送学生回家的经历,Aa甚至在洪水爆发期间不顾生命危险下河救起落水的学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T老师省下自己的口粮与学生分享,共渡难关。而更多的教师有替困难学生交学杂费,掏钱给学生看病等义举。

乡村教师勤勉自律,职业尊严感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情操。有教师认为“这孩子这一辈子就这一回从你手里过,你要是把他耽误了,这一辈子都耽误了。我觉得学生叫我们老师,不是白叫的”。从教几十年来,对学生“一个一个巴拉”,一个都不放弃。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也坚信“读书有用”,认真备

课,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老师”。这其实是一代乡村教师的写照。

(二) 对乡村建设的贡献

这一时期乡村办学的特殊性使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联系非常紧密,这也使乡村教师成为乡民社会的一员,为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并获得了乡村干部和群众的认可。

1. 承担乡村扫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大规模扫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乡村教师。访谈发现,这些教师基本都有扫盲工作的经历,他们白天在乡村学校上课,晚上到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计算、唱歌、画画等,为新中国成人扫盲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建设乡村文化

在建设新中国乡村文化的事业中,乡村教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50年代,乡村开办农民夜校(扫盲班或识字班),组织文艺宣传队,移风易俗,改造乡村文化,教师成为夜校和宣传队的重要力量。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农民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编排具有思想内容的戏剧。课余时间,他们到村头做墙报、画漫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中,教师带领学生深入生产劳动第一线,采访好人好事,表演文艺节目。他们还帮助村民写信、读信,为姑娘们绣花描花样,每到新年给村民写春联,喜事新办等。

3. 培育乡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乡村较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些是靠乡村教师引入和维持的。为了解决缺少现代科技知识的问题,乡村教师成为社队和村民的义务电工、农机修理工,甚至医药顾问。他们帮助修理大队、公社的广播设备,帮助农家修理电灯、收音机,还帮助建立水电站。教师Aa所在山村用电困难,但水资源丰富,他就用自己掌握的物理知识帮助当地设计、修建了一座小电站。90年代,他又把山上的电视信号引下来,方便村民看电视。这些为农村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参与乡村生产劳动

这一时期,国家号召“支援农业生产”,鼓励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学校则按农时放假(如春播假、夏锄假、秋收假),每到农假,教

师就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春天里,教师要带学生在田地里松土、捡石,为春播做准备;夏天要参加夏锄;秋天要参与收割,运送稻谷;冬天要拾粪施肥。接受访谈的每一位教师都能说出组织学生四季参加农村劳动的情况。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工作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对于师资队伍建设和具有重要价值,值得认真总结。

(一)主管部门和乡村基层组织共担基础教育责任,建设了一支来源广泛、门槛较低、数量庞大、相对稳定的乡村教师队伍

应该说,此时期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经验是国家和乡村基层组织共担基础教育责任,这使得乡村基层组织在上级政府机关资源有限的时候,创造条件为乡村子弟提供教育服务。在教师任用上他们采取“能者为师”的灵活策略,不拘一格充分挖掘当地人力资源,用较低的成本为乡村儿童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为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基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进城务工人员。如今,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基本责任,如何发挥地方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互济,值得深入思考。

(二)教师本地化密切了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乡村教师任用采取“哪来哪去”、就地取材的原则,密切了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乡村教师生于斯、长于斯,教学对象是亲戚,也是邻居,教师不仅是为乡村的未来负责,更是为“家人”尽责。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亲如一家的关系为那个时代的乡村教育谱写了温暖的歌谣。

今天,乡村教师的身份和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夜晚和周末则离开乡村回到城里,他们对乡村和农民子弟很难有前辈教师的那种温情,对乡村教育工作也很难有前辈教师的那份热忱,这是今天乡村教育质量并未随教师素质提高而相应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提醒我们必须重新认真审视师范生的招生和任用制度。

(三)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究竟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

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是权宜之计,是在人财物极度匮乏的年代为普及教育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仅从乡村教师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国家对乡村基础教育亏欠甚多,长期以来“能者为师”的乡村教师补充政策导致乡村教育严重落后于城市,成为我国城乡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之一。如今,在振兴农村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中,缩小乃至消除城乡教育差距,应该从重新认识历史上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开始。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刘伟 蒋重跃)

The Recruitment of Rural Teachers and Its Influence in Rural China From 1949 To 1976: A Research Based On Oral History

HU Yan, ZHENG Xin-r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rural teachers, discussed the recruiting mechanism and its influence from 1949 to 1976 in China.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ecruiting of rural teachers in China at that time was led by the villages and meanwhil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teachers at the time were locally recruited, but with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s under various categories (government-managed teachers and non-government-managed teachers),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and therefore were greatly diversified in teaching qualit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selection methods together recruited and trained a group of rural teachers, who love education, and love rural China, with high moral standards, high motivation and deep passion to rural education. They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educati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styles in rural China.

Keywords: early rural teacher of PRC; recruiting mechanism;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